

七千人大会与中共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

张曙明

1962年一二月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我们党自己纠正错误的一次会议,也是我们党探索经济发展规律的一次尝试。这次大会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60年代初严峻的经济形势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产生困难的原因。对统一全党思想,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调整国民经济方针起了积极作用。会议制定了相应的调整措施,使国民经济逐渐走上了有序发展的轨道,扭转了困难局面。

一、七千人大会对60年代初严峻的经济形势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

七千人大会是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制定一年后召开的。但它的贯彻仅仅是开始,经济困难仍很严重。为此,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告。本来,起草委员会在认真讨论之后,已形成了大会报告的修改稿。但中央认为,有必要对书面报告做进一步说明。于是,1月27日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常委在全体大会上作口头报告。刘少奇讲话更接近实际,提出了一些重要看法。他尖锐地指出:“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

与会人员对当时国内经济形势有两种估计:一种认为困难严重,问题还在发展,不能太乐观,充分估计才能引起重视;一种认为困难已经过去,经济已经回升,不要把形势估计得太严重了,估计严重了会泄气。为了统一思想,使大家对困难形势有充分的认识,周恩来在2月7日的讲话中,以大量的事实说明了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困难:生产降低,物资不足,农产品很

不足,人民的吃、穿、用都不够,市场供应相当紧张,还分析了许多问题中的主要矛盾所在。他指出,当时的主要矛盾:一是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起来,农业生产的水平,养活不了这么多的城镇人口和这么多的职工。二是工业生产任务用不了这么多职工。三是文教、科学事业的规模,跟我国的经济水平不完全相适应。四是我们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过多,机构庞大,开支浪费,人浮于事,工作重复,有许多无效劳动,甚至是有害的劳动。周恩来的认识和分析,为会议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会议对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了估价。“书面报告”指出存在4条主要的缺点和错误: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共产风’和一平二调等平均主义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虽然它是在肯定“三面红旗”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会议讨论中,许多人尖锐地指出了“三面红旗”的问题,有的还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刘少奇在1月27日讲话中,明确指出:“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18、419、353—35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七千人大会把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关键是农业欠帐太多,人民的吃、穿、用都不够。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不加强农业,不首先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是谈不上发展的。

二、七千人大会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产生困难的原因,为纠正错误,动员全党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起了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搞清楚这么大的困难是怎样造成的?为什么“大跃进”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许多同志对通常所说造成困难的原因,一天灾,二苏联逼债,三工作中有缺点的说法提出了疑问。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刘少奇在1月27日讲话中作了明确回答,他说:“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他借用湖南农民的话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不服。他还要求各省、地、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实事求是的判断。这样比较实事求是地讲明造成困难的主观原因是党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对教育全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挖掘犯错误的根源时,有代表指出关键在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斗争。大家“谈右色变”,总是以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脱离实际。部分代表认为,这几年所犯错误,应该划分为两段,即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前和之后,前段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是由于建设经验不足,后段则主要是党内民主生活和干部精神状态不正常。庐山会议前,任务虽重,压力也有,但大家干得很起劲。但反右倾以后,情况大为改变,干群心情沉重,看风使舵,摸上级的底,而不是按党的政策办事。

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的发言不能不接触到工作方法和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问题。有的代表指出,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也不是高指标,而是主观主义以及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惩办主义的组织手段。高指标、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由主观主义产生的。更有同志指出,这几年出现瞎指挥、高指标、脑子发热等问题,总的根源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上有错误,误认为生产力发展快,误认为很快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与此相关的是,不尊重等价交换,按劳分配、价值法则,以及剥夺了同盟军——农民等等。

对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确实有缺乏经验的问题。当时形势很好,大家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轻易相信了高产量和放卫星的经验。也有党内不少领导同志骄傲自满、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搞瞎指挥、强迫命令。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削弱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问题。上述分析,虽然不够彻底,但比较实事求是,特别是骄傲自满、民主集中制削弱这两点,切中时弊。刘少奇指出,由于我们急于求成,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因而,我们也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指出:“如果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在确定任务以前,先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地进行讨论,用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那末,我们就可能不会提出过高的超出实际不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如果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那末,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会通不过,会顶回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能够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刘少奇抓住违背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抓住破坏民主的倾向,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确实抓住了要害。

会上,广泛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是中央领导同志带头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在1月30日的讲话中表示:“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同时还指出,对他的缺点错误不能隐瞒。刘少奇在大会或小组会讲话中都代表中央作自我批评,并号召:对中央、中央部门、中央哪个同志有意见,“都要翻箱倒箔而出”。周恩来在大会讲话中,专门讲了两个例子,具体地检查了他个人的错误。第一个例子,是他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的报告,片面地规定了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即: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就是跃进,超过15%就是大跃进,超过20%就是特大跃进)。第二个例子是,他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限期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造成权力下放过多过散的错误。这个文件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但是,周恩来还是作为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承担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53—354、420、421、433页。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责任,给到会同志以鼓舞和教育。各级党委和主要领导同志都主动为错误承担责任,进行检讨。这是全国解放后开得最成功的领导干部交心会。

就1960年代人们的实践水平和认识水平而言,上述对产生困难原因的分析以及这些自我批评确实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无疑这为全党思想的统一和纠正错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动员全党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起了积极作用。毛泽东的讲话还明确使用过“从实践出发”的提法,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三、七千人大会制定了相应的调整措施,使国民经济逐渐走上有序发展的轨道。

七千人大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讨论了1962年全面贯彻八字方针的具体任务。会上虽然有人仍想“大跃进”,仍然念念不忘要“超英”,但是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大多数人正视现实,切实地讨论了如何尽快克服困难的问题。集中大家的意见,“书面报告”提出了1962年经济建设方面的10项任务。强调要加强农业战线的工作,多生产粮食、棉花、油料和经济作物;发展轻工业生产;坚决实行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增产节约,稳定物价;整顿秩序等。2月7日,周恩来在讲话中,又具体地提出了克服当时困难的8条主要办法:(1)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2)争取农业增产,主要是粮、棉、油;(3)努力增加工业生产,首先是增加能够供应市场的工业品的生产,同时保证完成煤、木、矿、运的任务;(4)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坚决下马;(5)要统一、全面、彻底、合理地进行清查核资;(6)大家一起走“前门”,反对走“后门”,搞好市场供应,争取财政收支平衡;(7)坚决还帐,努力承担国际义务;(8)建立新秩序,树立新风气。这些克服困难的任务和办法的提出,使全党有了统一的认识和明确的努力方向。虽然许多任务的组织落实不够具体,但是,“坚决下马”的方针、原则确定了,为后来“西楼会议”陈云提出一套具体的调整措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

七千人大会初步统一全党认识后,调整工作得以全面展开。但当时面临着1961年度粮食比1957年减产800亿斤的巨大压力,市场供应紧张,通货膨胀严重,城乡人民生活极端困难,而已经摆开的基建规模仍然超过国家财力物力之可能,当年财政预算又有数十亿元赤字。面对如此险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在刘少奇

主持下,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其一,刘少奇坚持从实际出发,断然作出对形势的新判断,明确指出当前的经济形势,“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这不但直接修改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所作“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结论,也与毛泽东当时所作困难形势已退到谷底,以后就是一天天向上的判断显然不同。其二,刘少奇果断地向中央提出恢复中央财经小组以加强调整工作的全盘筹划与领导,并竭力推荐和鼎力支持陈云出任组长,此举对推动调整进程发挥了巨大作用。

陈云受任于危难之际,复职后,即投入了紧张复杂的工作。他在3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提出:“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市场上”。他还特别论述了综合平衡问题,指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是客观规律’”,“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周恩来对综合平衡作了精练的概括:“可以写一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刘少奇和当时处在中共中央一线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全力支持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云“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的意见制定的1962年调整计划,作出了进一步大幅度调整退够的决策。他指出这样大幅度调整 and 后退不是消极的,“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目前经济情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在以后继续前进。我想,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实践证明大幅度调整退够的决策确是当时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

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经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严重挫折后,经过几年的调整,取得明显成绩,开始沿着良性循环的轨道向前发展。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不久又遭遇巨大的曲折,没有把握好客观规律,逐渐向“左”倾错误道路上滑行,以致让阶级斗争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牢记的教训。

作者简介:张曙明(1949—),男,安徽南陵人,中共安徽省马鞍山市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汪谦干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0、303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44—445、448页。

《陈云文选》(1956—1958年),第199、202、201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第36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